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

主编／谢冕 副主编／李杨

# 艰难的指向

●「新诗潮」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

王光明／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

主编 谢冕 副主编 李杨

# 艰难的指向

● 新诗潮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

王光明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

JIANNANDEZHIXIANG

王光明 著

责任编辑：胡卓识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2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0 000字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  
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印数：6 000册

定价：6.50元

# 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总序

谢冕

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已把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抛在了身后。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百年的长途之上，洒满的是汗水、泪水和血水。那是一条为苦痛和灾难所滋润的道路，那又是一条屈辱和创伤铺成的记忆之路。近百年我们中国人希望过、抗争过，也部分地到达过，但依然作为世纪的落伍者而存在。落伍的感觉残忍地抽打着中国，使我们站立在世纪末的风声中难以摆脱那份悲凉。

中国知识分子未曾辜负这一百年，他们和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共命运。自从上一个世纪中叶中国海附近出现了在当日的中国人看来是怪物的西洋舰队，那隆隆炮声中腾起的硝烟惊破了强盛的帝国梦想。随后开始的是列强为所欲为的践踏。中国从自认为天下第一的王国尊严下跌到负数。这造成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重压。

这一百年有过无数志士仁人的奋斗牺牲，知识分子没有回避他们承担的那份感世忧时的沉重。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般的保守麻木，使中国知识分子自然生发出文化精英意识。这使他们自觉地对时代和社会作出承诺。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激情与作为精

英的使命感相结合，造出了极为动人的精神景观。近百年的社会激荡之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与智慧的投入。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本世纪下半叶为结束中世纪式的文化暴虐而进行的抗争，中国知识分子都付出了积极的劳绩。

艰难的时势加上历史的积重，特别是与外界接触之后反顾自身，一些新鲜的先锋的思考遭受封建积习的禁锢，促使知识界的先进人士对传统文化秩序持警惕的和怀疑的态度。当挽救危亡和变革现实的奔走呼号受到传统势力的扼杀和阻挠，这种激进的立场便获得了社会广泛的同情与理解。由此派生出来的革命性即寓于对传统的否定之中的价值判断，也就成为当日普遍的思维倾向。

这当然是一种偏颇。中国悠长的文化传统是历代中国人创造实践的综合，它拥有的智慧性和沉雄博大都曾使世人为之倾心。在古代和今日，中国文化为丰富和促进世界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无可置疑。中国人理应为自己先人的建树自豪。但中国文化在它发展历程之中形成的封建性体系和价值观，作为维护过去社会形态的原则体现，已成为现代社会前进的羁绊，这当然具有消极的品质。基于这样的前提，对传统文化加以质疑而有所扬弃有它的合理性。

我们希望站在分析的立场上，我们愿认同于近代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呐喊、抗争以及积极的文化批判。因为它顺应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它的功效在于排除通往这一目标的障碍。但我们理所当然地注意到保存和发扬那些优良传统的必要，而避免采取无分析的一概踩倒的激烈。

不偏不倚是庸俗的。因为这种想法迎合了所有人而可能掩饰和冲淡原本的积极动机。本世纪才智之士的文化批判是前驱的抉择，觉醒的知识者心仪于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决绝于陈旧

的历史重荷。为图新而弃旧，因前进而义无反顾。他们把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一律视为压迫而指归于反抗。要是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对自由人性和民主体制的戕害，我们当然不会对这种矫枉过正的言行感到意外。当然，我们希望当我们面对现代的诱惑时不至于忘却先世的辉煌——这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膜拜。

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的危亡时世太重也太深，为此文学曾自愿地（某些时期也曾被迫地）放弃自身而为文学之外的全体奔突呼号。近代以来的文学改革几乎无一不受到这种意识的约定。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时，宁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象；人们发现教育、实业或国防未能救国时，宁肯相信文学能够救民于水火。文学家的激情使全社会都相信了这个神话。而事实却未必如此。文学对社会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它通过愉悦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对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膏丹。

一百年来文学为社会进步而前仆后继的情景极为动人。即使是在文学的废墟之上我们依然能够辨认出那丰盈的激情。我们希望通过冷静的反思去掉那种即食即瘕的肤浅而保留那份世纪的忧患和欢愉。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导引，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着沉沦。文学救亡的幻梦破灭之后，我们坚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正是因此，我们方在这世纪黄昏的寂寞一角辛苦而又默默地播种和耕耘。

文学回到家园的醒悟仅仅是最近十年发生的事实。在以往我们花费在非文学上面的精力的时间太多了。在文学研究领域，这种花费表现在文学被指令无休止地为其它意识形态注释。他们借文学说他们的故事，文学真的变成了叫做传声筒的东西。现在我们终于有权力发问：文学难道不应关心自身？当然文学应该

也可能关心文学以外的世界。但不论是权威还是神圣，他们要文学做的，必须通过文学的方式和可能，这包括文学的旨趣。

文学必须建设和完善自身而后才能建设和完善社会，文学也只能通过这样的途径关注社会。这一百年的文学发展迅猛但并不健全，在某一个或几个时期（如六十年代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文学甚至成为社会的破坏因素，而这一切恶行却是以庄严和神圣的名义进行的。

作为二十世纪的送行人，我们感到有必要把这一代人的醒悟予以表达。这种表达当然只能通过文学的方式。我们期待着放置于百年忧患背景之上而又将文学剥离其它羁绊的属于文学自身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意味着绝对的纯粹性，它期待着文学与它生发和发展的背景材料的紧密联系。我们希望这种思考是全景式的，通过对于文学追求的描写折射出这个世纪的全部丰富性。

以往对于文学的描写大体总是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笼罩之下进行。文学在批评和历史研究方面的独立的合法性并未得以确认，文学没有进入自由状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畴的提出为健全文学研究提供了契机。以一百年的文学为单位对文学的总体观照的方式自然地扬弃了非文学的干扰，从而有可能对文学进行独立的和自由的考察。我们希望这种文学研究不仅为纯粹学术品质的倡导提供可能性，还希望为下一个世纪的人们对我们所传达的世纪之交的情怀保留下一些特殊的记忆。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日于厦门美仁新村

# 目 录

绪 论 回望新诗潮 .....	( 1 )
第一章 今天：艰难的指向 .....	( 6 )
一、五四话语 .....	( 6 )
二、话语功能的变革 .....	( 13 )
三、民族大众的话语指向 .....	( 22 )
第二章 矛盾重重的诗篇 .....	( 29 )
一、什么样的“回答” .....	( 29 )
二、矛盾重重的诗篇 .....	( 32 )
三、矛盾的普遍性 .....	( 41 )
四、面对矛盾的反思 .....	( 43 )
第三章 骚动的河流 .....	( 48 )
一、渗入地下的水滴 .....	( 48 )
二、地下读书热 .....	( 52 )
三、骚动的河流 .....	( 54 )
四、跃上地面 .....	( 59 )
第四章 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 .....	( 60 )
一、从“古井”到“喷泉” .....	( 60 )
二、走向现代主义 .....	( 74 )
第五章 他们带来了什么 .....	( 91 )
一、生命体验的艺术折光 .....	( 93 )
二、主体自我确立的追求 .....	( 100 )
三、个人话语空间的重建 .....	( 104 )
四、“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 .....	( 112 )
第六章 一个诗人的里程 .....	( 118 )



一、浪漫主义的基本倾向·····	(118)
二、理想主义者都有光辉的痛苦·····	(126)
三、“重聚自身的光芒返照人生”·····	(139)
四、“拐弯抹角找出直截了当”·····	(143)
<b>第七章 为什么争论</b> ·····	(150)
一、从“新的课题”到“三个崛起”·····	(150)
二、现代主义的争论·····	(158)
三、为什么争论·····	(162)
<b>第八章 一个“崛起”的批评家</b> ·····	(170)
一、一代知识分子的幸与不幸·····	(171)
二、落脚点是对传统的思考·····	(177)
三、真实、开放的文艺观·····	(184)
四、一个有风格的批评家·····	(190)
<b>第九章 新生代：上升与下落</b> ·····	(197)
一、“潮水已经漫到脚下”·····	(197)
二、外部与内部·····	(202)
三、生命认同·····	(207)
四、“他们”与“非非”·····	(216)
五、新生代与新诗潮·····	(224)
<b>结 论 永远的界碑</b> ·····	(228)
〔附录一〕 新诗与旧诗·····	(234)
〔附录二〕 诗与诗人·····	(245)

## 绪论 回望新诗潮

新诗也会变旧，被遗忘湮没者不计其数。从胡适举起白话诗的大旗，到新月诗人进行格律形式的试验；从李金发、戴望舒们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肇事，到中国诗歌会革命内容和大众形式的倡导，然后又经历了艾青的崛起，四十年代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新民歌派的三足鼎立。继而进入下半个世纪，又有政治抒情诗的出场，大跃进新民歌的喧嚣；当诗歌面临绝境时又有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的爆发，不仅召唤出几代“归来”的诗人，还哺育出一群又一群自觉疏离中心意识形态和正统美学，在边缘筑巢“乌鸦”；从新诗潮到第三代……本世纪中国诗歌事件难以尽数。但是就诗论诗，诗歌现象恐怕比能在文学史上站得住脚的诗人还要多。时间真的是残酷无情啊！多少当年曾被注意的作品已经不忍卒读，即使是八十年代初甚嚣尘上的新诗潮，由于客观和主观双重原因造成的队伍分化，和“读者群”的更代换新，也早已不是人们注意的中心。

当然近百年的时间毕竟还是太短，以大众传播和消费导向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读者大众的趣味也很难作为诗歌艺术价值的可靠尺度，加上中心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对“大多数”话语的影响，造成了真正艺术汰选的诸多空洞与盲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标准的缺席与虚无，相反，它召唤一种自觉艺术立场的冷静、严

肃的审度。然而只要是真正的诗，真正为新诗发展作出过开拓性建树的诗歌流派，就经得起严格的检验。犹如当年“朦胧诗”的发难，那些横眉怒目的责骂远去了，被责骂的诗却活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诵读中。犹如后来年青气盛的变革者，不甘在它巨大的阴影下写诗，提出“打倒”和“pass”，到后来终于明白，自己可没少承继他们的精神资源和技术资源，正是由于他们的开拓，人们终于挣脱了五、六十年代的诗歌阴影，为展开新的诗歌话语空间提供了可能。

新诗潮的出现与其说是当年的盛事，不如说是当代新诗的幸事。当代诗歌的危机与困境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诗歌运动的总爆发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然而，天安门诗歌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不是自觉的诗歌变革。虽然诗歌危机摆脱的深层动力不能不以此作为起点与动力，但它终究是曾被抽空实质的人民政治和道德话语的回归，还很难据此判断当代诗歌危机的终结和生机的演示。

社会和时代催化诗歌，但诗歌的话语空间永远是个人的创造。个人，永远是诗歌中最活跃、最具有创造力的具体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当代诗歌的几次群众运动（如大跃进民歌、小靳庄诗歌）实绩甚少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诗歌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努力“人民化”的过程，在人民的话语活动被强行纳入既有模式的历史条件下，反而一步步陷入绝境并与初衷日益背离，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讽喻。

新诗潮也不是没有它社会化、政治化和道德化的倾向，特别是在它较早的浪漫主义时期，其抒情方式和诗歌意象中存在集体经验的映象也是明显的。然而，这究竟不同于四五天安门诗歌，甚至不同于“归来诗人群”的诗歌，不是对于国家话语的套用和利用，而是具体的抒情主体和个人化的意境、场景。它

把话语从意识形态承诺和道德承诺中分离出来，展示了个人话语空间想象力和创造性。

话语功能的个人性本来就是本世纪思想文化志士仁人努力的目标。从梁启超发动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白话诗运动，其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要解决思维与语言的分离，使语言能够“适切表现现代人的情思”说自己的话，“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意思”（周作人语）。它对生硬的、负重过多而往往把人引向虚假荒诞的文言的挑战，大大开拓了个人的话语空间，使五四文学成了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象喻。当然，这场语言革命由于落后民族与发达社会之间的巨大落差，本身带着极大的社会功利性（例如教育与启蒙的动机），但是，在有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的作家、诗人手里，则在自我与时代、个人与社会、精神指向与当前事功等矛盾冲突的巨大张力场中，开拓出了独特的话语空间，建构了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特有的景观。然而，后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和意识形态的演进，离胡适当年“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让它与启蒙运动逐渐分开，增强其文化指号功能的理想，不是趋近，而是逐渐远离。一方面是中心意识形态的强行渗透，一方面是面向人民大众的反复提倡，哪里还有多少个人话语的立足空间？所以直至文革，众口同腔的“国语”是存在的，文学就谈不上了，“文学的国语”理想已经成了非常遥远的回忆。

众口同腔的“国语”标示着个人存在的根本空洞。尽管个人话语并不等于文学的话语，它们还存在着相互吸引又互相排斥的关系，如海德格尔所说：“诗并不是随便任何一种讲述，而是特别的讲述，它首先引出了对我们所讨论的以及日常语言中

关涉到的一切敞开。”<sup>①</sup>但文学语言首先必须从千篇一律、毫无活力的“通用象征”指号中摆脱出来，回到个人话语活动中去，使之在言说过程中流动不息，让人们头脑中出现萎缩、板结的那部分细胞复活，让它在无限可能的生成中，使人性朝希望的地平线展开。新诗潮了不起的历史功绩，首先就在于话语的个人感受与思维指号的本位回归。

开初似乎是二三十年代文学话语的回光反照，充满郁达夫式伤感的热情，戴望舒、何其芳式的惆怅和忧郁，在更优秀的诗人笔下则有鲁迅《野草》式的内心风景和孤寂狷傲，——这是言语活动的个人归位，以话语风格的个性化和大致相通的特时代的生存经验感受为标识，宣告了经过漫长断裂时期之后个人话语的重新接轨。进而是诗歌文体话语的自觉，自北岛提出“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不够用了”开始，新诗潮诗人已不满足于历史生活和个人感受的回忆性表述，甚至对表述本身也产生了危机感，努力通过意象和整个话语结构的象喻追求，让当代诗歌话语从个人化向诗歌本体化过渡。

诗歌话语变化、调整的意义不只是诗歌修辞学的。从国家话语到个人话语，再到诗歌本体话语，不仅仅是诗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运动与展开，不只是诗歌写法与趣味的变化，甚至不限于具有独特经验的一代人的思想情感历程。尽管这个诗歌流派并不完善，尽管它有错误和失败，但在中国二十世纪诗歌历史的语境中，无论你站在哪一个角度谈论二十世纪中国新诗，新诗潮无法省略，特别是在当代，它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新诗困境的突破，而且引起人们对诗人位置、诗歌功能、诗歌表达方

---

<sup>①</sup>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

式的重新审度。

新诗潮，并不因为它不再是诗坛热点而减少谈论的意义。

## 第一章 今天：艰难的指向

中国新诗是打破古典诗歌固有形式和内容，接受外国诗歌与民间诗歌的影响，以现代汉语表现现代人思想感情的一种新的诗歌体制。它从逐渐僵硬了的古典诗歌范式里争取自由表达的渴望，是复杂多变的现代生存感受对程式化、平面化语言秩序的反叛；它从语言和表达方式下手并以诗歌言说方式的改变为目标，力图改变自己的传统承诺实现自身的功能；它当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又至今尚未取得完全的成功<sup>①</sup>，这不能完全归结于新诗人的不努力，而是有着极其复杂的时代原因和新诗发展中自身的问题。

以今天的诗歌话语言说今天，让今天的世界和人性在诗中敞亮，是一项多么艰难的诗歌工程。

### 一、五四话语

语言背后当然是有东西的。任何言说性的语言本身都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游戏和娱乐，信仰与偏见。中国传统社会末期书面语言与人们操持的口头语言的严重脱节，正反

---

<sup>①</sup> 请参阅〔附录一〕“新诗与旧诗”。

映了古文言、文体所沉淀的精神和意识，与当代人的思维、情感相捍格。因此，早在文学革命的发端，胡适就认定了：“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它成为公认的文学工具，使它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其他方面。”<sup>①</sup>在胡适看来，文学革命实质上是一场语言上的革命，“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sup>②</sup>，他对新文学的最初构想是：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sup>③</sup>

胡适最初的新文学的构想，有文字体裁的“形式之革命”和主张表现真实“个我”的“精神上之革命”两方面，但他对文字体裁的形式革命的考虑显然更为具体，甚至认为它是开辟中

① 胡适：《逼上梁山》。

② 胡适：《尝试集·自序》。

③ 胡适：《寄陈独秀》（1916年10月）。



国文学活路的“唯一利器”。作为一个自由派的留美学者，胡适从民初以来的拼音文字运动和近代欧洲各国的国语化历史中，感觉到了文字体裁革命的巨大文化意义，尽管他并不明了“人类语言没有外部，它‘禁止旁听’”的现代观点，但显然比早他提出文学革命的有识之士更懂得改变语言的重要意义。为什么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和南社提出的“革理想而不革形式”的文学革命<sup>①</sup>都未开一代风气，就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符号、话语的深层隐含，没有看到它们就是人的存在活动本身。当然，在我们这个重“名分”的国度里，在尚“实质”的时代氛围中，即使具有超前意识的胡适，也不能不受时风的侵染，调整自己的表述策略。由于与陈独秀的讨论中，胡适受到这八条原则会使“文以载道”继续存身的婉转提醒，他在三个月后写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对那八条原则的次序进行了重新排列，提高了精神革新的地位，并删掉了“语语须有个我在”的字句<sup>②</sup>。这种次序排列的调整和话语删削，不只有传统与时代的象征性，也昭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向度。

这与胡适思想理论的彻底性与否无关，制约因素存在于个人之外。尤翼有一篇精彩的文章谈到：由于中国的民族和文明在近代以来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迫使中国不得不随时集聚最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来接受并参与世界性的军事及经济竞争，因此，无论社会改革家还是文化革新斗士，都把目光投向了“国民”社会<sup>③</sup>。这样，胡适将“形式”与“实质”的座次调换一下，倒也

<sup>①</sup> 当时也以文学革命为口号，但都主张以传统语言和形式创新思想。如南社核心成员柳亚子认为“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柳亚子：《寄杨杏佛书》。）梁启超则主张用古人之风格表现“真精神、真思想”（梁启超：《夏威夷游记》）。

<sup>②</sup>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这八条原则变为：“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sup>③</sup> 尤翼：《也谈八十年代文学的“西化”》，载《今天》1991年3、4期。